

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

繁华与落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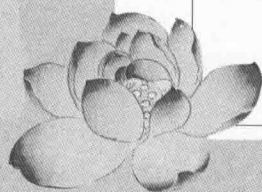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繁华与落寞

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

陈福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华与落寞: 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陈福升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301-26674-8

I. ①繁… II. ①陈… III. ①柳永(约987~1053) — 宋词 — 诗词研究 ②周邦彦(1057~1114) — 宋词 — 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9435号

- 书 名 繁华与落寞: 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
FANHUA YU LUOMO
- 著作责任者 陈福升 著
- 责任编辑 武 芳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674-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6449
-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227千字
-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风光却被雨打风吹去	11
第一节 风行于北宋民间的柳、周词	14
一、在民间风靡一时的柳、周词	14
二、柳、周词在北宋民间风行于世的原因	19
第二节 在北宋士人中被雨打风吹去的柳、周词	31
一、万众瞩目的柳永词和颇受冷落的清真词	33
二、北宋词人在创作上对柳词的学习和借鉴	54
第二章 岁岁年年人不同	63
第一节 在民间继续传唱,风光犹在的柳、周词	66
第二节 在南宋士人中冰火两重天的柳、周词	70
一、宋代柳、周词结集与入选各种选本的情况	72
二、南宋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	77
三、周邦彦词对南宋词人创作上的影响	105
第三章 淡妆浓抹各相宜	115
第一节 金元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	117

一、批评柳永词俗艳的金朝士人	117
二、肯定柳词之音律、对周词多元评价的 元代士人	119
第二节 柳、周词对金元词人创作上的影响	125
一、柳永词与金、元通俗文学的创作	125
二、周邦彦词对金元词人创作上的影响	134
第四章 春去春又来	139
第一节 明代选本中的柳、周词	143
第二节 明代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	145
一、主情的词学观念与明代柳、周词的接受	145
二、王世贞对清真词评价的重新审视	154
三、冯梦龙对柳永之词品与人品问题的重新认识	158
第三节 明词创作上对柳、周词的接受	161
第五章 乱花渐欲迷人眼	165
第一节 清初词学对柳、周词的接受	167
一、清初词家对柳、周词的品评	168
二、柳、周词对清初词家创作之影响	185
第二节 浙西词派对柳、周词的接受	194
一、浙西词派选本中的柳、周词	194
二、浙西词派占主导地位时期词家对柳、 周词的品评	197
三、柳、周词对浙西派主导时期词家创作上的 影响	212
第六章 不尽长江滚滚流	219
第一节 常州词派对柳、周词的接受	220
一、常州词派选本中的柳、周词	222

二、常州派占主导地位时期词家对柳、	
周词的品评	227
三、柳、周词对常州派词家创作上的影响	262
第二节 王国维对柳永、周邦彦词的接受	266
结 语	273
附录 1 历代选本中柳、周词的入选数量和名次统计表	283
附录 2 历代选本中柳、周词入选篇目情况统计表	284
参考书目	292
跋	299

引言

柳永^①和周邦彦^②是宋词发展史上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后人常“柳、周”并称，把二人归为一类词人，如“圣求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③，“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④，“如此风情，周、柳定当把臂”^⑤，“《词综》一书，鉴别精审，殆无遗憾。其所自为，……直欲平视《花间》，奴隶周、柳”^⑥，“情韵有美成、耆卿所不能到”^⑦等点评。他们的词作对后世的影响广大而深远，形成了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词人，结束了词坛小令一枝独

① 柳永(987?—1057?),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别号柳七,福建省崇安县人,有词集《乐章集》。

②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有词集《清真集》。

③ (清)王弈清等:《历代词话》卷六“吕渭老词婉媚深窈”引黄升语,见《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204页。

④ (清)沈谦:《填词杂说》“学周柳苏辛当以离处为合”条,见《词话丛编》,第635页。

⑤ (清)贺裳:《皱水轩词筌》“朱希真风情词”条,见《词话丛编》,第698页。

⑥ (清)郭麐:《灵芬馆词话》“词综鉴别精审”条,见《词话丛编》,第1503页。

⑦ (清)张惠言:《张惠言论词》附录五《续词选批注》评王介甫《桂枝香·登临送目》一词,见《词话丛编》,第1622页。

秀的局面,使得慢词与小令^①并驾齐驱,对后世词人产生重大影响,在词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这么说,没有柳永对慢词体制的创新与改进,就没有苏轼对词的革新,也就没有标志宋词成熟的清真词。而周邦彦的清真词,在继承、总结前人所长的基础上,又能不断创新,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成为宋词成熟的标志,而且其词作所表现出的新的创作发展趋势,对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陈廷焯所言:“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②可见,周词在宋词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柳永词和周邦彦词之间关系密切,二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传承影响,“周词渊源,全自柳出。”^③“周邦彦虽较柳永晚近一个世纪,中间又隔着苏轼等众多大词人,但周词与柳词关系最密,特别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方面以及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二者之间如草蛇灰线,存在着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的关系。”^④周邦彦不仅在词的创作手法上对柳永进行了学习和继承,他们二人在词的风格方面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二人都喜欢写恋情而格调柔媚;在一些词作中都喜欢用民间的俗语、俚语入词,而词风明快。柳永、周邦彦也都精通音律,两人对改进和完善词的乐律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宋赵以夫《虚斋乐府自序》(《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就说:“唐以诗鸣者千余家,词自《花间集》外不多见,而慢词尤不多。我朝太平盛

① 慢词与小令: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或小令。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称为慢词。令、慢是词的两大类。

②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词至美成乃有大宗”条,见《词话丛编》,第3787页。

③ (清)蔡嵩云:《柯亭词论》“周词全自柳出”条,见《词话丛编》,第4912页。

④ 赵仁圭:《论宋六家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时,柳耆卿、周美成差为新谱,诸家又增益之,腔调备矣。”^①指出了二人在词的乐律上所作的革新与取得的成就。在宋词发展的一段时间内,柳、周词还起到代词谱的作用,许多人是按照他们词的声律格式来填词的,如南宋末的《三英集》就是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人遍和《清真集》的词调合编成的词集。这里他们完全是把清真词的词调作为定谱来看待的。由此可见后人对二人词作乐律之推崇。另外,他们的词作题材也非常相近,大都为歌妓词和抒发羁旅行役之感的词作,读起来给人相似之感,后人常以“柳、周”并称,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和一些词家的词作备受冷落、无人愿歌不同,柳永、周邦彦词备受瞩目,拥有大量的受众。在民间,二人之词流行于世,风靡一时,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且直到宋末元初仍有歌妓能歌周邦彦词,柳、周词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柳、周词在士大夫、词论家中也拥有大量的受众。柳永词在士大夫中的知名度是同时代其他词人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士大夫们对柳词多持“批评”的态度,但这种贬斥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接受,只不过是立场不同,“反向接受”而已,尤其在“天下咏之”的状况下,柳永词在士大夫中也是一个强大的存在,这是不能抹杀的客观事实。与柳永词备受争议的境遇不同,周邦彦词因其技巧的成熟和风格的沉郁顿挫在士大夫中由隐而显,逐渐受到欢迎和推崇,拥有大量的受众,直至后来被以“词中老杜”相许,得到很高的评价。

由于柳永、周邦彦二人词作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本书将他们的词作接受情况放在一起论述。但两人的词(以至于词人本人)在历代“读者”(“读者”在这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除作者以外,历

^① (宋)赵以夫:《虚斋乐府自序》(《影刊宋金元明本词》),见孙克强《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代所有和作品发生关系的人,包括普通的阅读消费者、借鉴学习的创作者以及批评鉴赏的评论者等)的“眼光”中却又有许多不一样,有的方面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在词人和词的关系方面,两人所受的“待遇”就大不一样。柳永本人因其词而遭受上层社会的冷遇,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关事迹在《宋史》中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学者只能依靠对词话、笔记小说、地方志等一些零碎资料的整理来推测其生平。不仅如此,后世文人又由鄙夷其人而殃及其作品,进一步鄙夷其词。例如这样的记载:“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猥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媾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①可见柳永在所谓正人君子的士大夫眼中,只是“有才无德”的浪子形象,其作品也只能靠取悦市井俗人得以流传。而周邦彦却因其词而提举大晟府,奉命“制词实谱”,是真的“奉旨填词”了。事实上在提举大晟府前后他的词就已渐有声名,从南宋末开始,备受推崇,到清朝,对他的评价达到顶峰。如周济认为“清真,集大成者也”^②,近代的王国维也说“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③,至以周邦彦为词坛杜甫。当然,清真词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怀,不能和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相提

① (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宋)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二“柳三变词”条引,见《词话丛编》,第171页。

②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页。

③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见吴则虞校点:《清真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9页。

并论,以杜甫在诗中之地位来比拟周邦彦在词坛的成就,仅仅是就其艺术手法而言的。晁公武《鹧鸪天》有这样两句:“倚阑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连能唱周词的人都会显得与众不同、品格不凡,清真词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对比柳、周两位词人因其词作而导致的境遇,简直是天上人间!这种天壤之别,也促使本书把他们的词作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和分析。

任何人所作的任何评价,都来自于对自身所接受的信息的评判,这就涉及一个标准和尺度问题。柳永、周邦彦及其词作的命运、遭遇及所获评价之所以大不一样,就和这个评判的标准和尺度直接相关。时代不同,评判的标准和尺度就会有所变化,得到的评价和待遇,也就会有所不同。对柳永、周邦彦及其词作的接受和评价也莫能例外。随着时间的变迁,他们及词作受到的待遇和评价也就有所不同。以清真词为例,虽然在当时的民间风行于世、广受欢迎,却并未引起当时士人和词家的注意,偶有关注,也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知音识曲的风流才子来看待,并没有认识到周邦彦词巨大的艺术价值,这种反差使周邦彦在当时士大夫中的词名显得比较隐晦。而从南宋开始,清真词在士大夫中的声名日渐显赫,此后的历朝历代也基本将周邦彦定位在一流词家的位置,即便随着朝代更替略有变化,波动也不是很大。到清代,对周邦彦词的评价达到了顶峰,被认为是词家“集大成者”“词中老杜”,甚至认为其词已“极词中之圣”^①。周邦彦词这种地位的变化,就是时代不同导致评价的标准和尺度也不同的反映。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对词人词作的评价,有的会从褒变成贬,有的会从抑变成扬,但是有些东西却永远不能被容纳,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在柳永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柳永的词在当时即声名远扬,“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

① (清)蒋兆兰:《词说》“清真词中之圣”条,见《词话丛编》,第4632页。

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不论喜欢也好,批评也罢,其作品作为一种强大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不能漠视的,包括反对、鄙夷他词作的人,都对他的词作耳熟能详,如晏殊在对柳词进行贬斥评论时,都能随口道来柳永作品中的词句。但是,柳永的词除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玉蝴蝶》(望处云收雨断)等几首以外,历代评价一直不高,其词作反而因其露骨的“俗艳”而被历代士人所不耻并受到猛烈抨击。更主要的是“因词及人”“以词论人”,使得柳永本人不仅在当世即因词而不被上流社会容纳,在后世也是作为一个“浪子”“无行文人”而被接受、传递,而且经历了近千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些当然和作者及作品本身有关,但关键问题还在于一代代读者对他们词作的接受、学习和传递。针对柳永的这种作品风行于世、作者却备受抨击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历代不断变化的审美标准中梳理出词坛发展的主流思想,进而看到我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强大作用。

前辈学者对这两人所作研究很多,成果也不少。这些研究集中于对词人进行生平考证和总的评价,柳、周词的艺术风格特征以及柳、周词的地位、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这几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都称得上深入精到,对上述问题也作出了可信的回答。如果本书再从上述方面考察柳、周词,那不仅仅是班门弄斧,而且也无助于对前面所提到的二者之间的种种相似与不同作出一个新颖而合理的解答,因此,应该寻求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柳、周词。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由作者、作品、读者和客观世界四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互动过程^①,而我们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盲点,即对读者这个因素没有给予足够多的考虑,甚至没有考虑。既然我们承认读者在文

^① 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见周宪:《超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4页。

学活动中的重要性,在文学研究中就必须考虑到读者这个因素,否则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不全面的。既然对柳、周词的评价都是历代的读者所作出的,和一代代读者对他们词的接受、学习、传递有关,那么从历代读者评论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比较其接受情况,也是对柳、周词进行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而且这种超越作品及作者本身,从一个外在的全新视角^①——读者的视角来研究柳、周词的方法,也是对停留在分析作品、评价词人的固有框架的一种突破。通过从读者接受角度对二人及其词作所进行的分析研究,我们对柳、周词作的种种相似与不同及其成因,应该会有有一个新颖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力图从“读者的接受情况”这一角度入手,对文学史上同一类词人及其词作在历代的接受情况予以分析探讨,以期脱离一般化概述的窠臼,作出针对不同考察对象的新颖、合理而又具体的论证。

文学本身有着自身独立的审美特性和形式特征,但同时又与历史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并从根本上受制于时代背景的变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就可以把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与其历史依存性更好地统一起来,更利于全面地、辩证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作者一个人赋予的,它是在读者的具体阅读过程中不断生成和丰富的,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接受、评价活动,也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创造和确立。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尧斯就很形象地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

^① 此处言全新的视角,仅就柳永、周邦彦词并列研究而言。就词的接受而言,邓乔彬先生在《唐宋词美学》(齐鲁书社,1993年)一书中,已有一章“唐宋词的美学接受”,从接受的情感基础和文化时态、接受过程及审美感受、“寄托”的政治解读与接受的再创造等三个方面,对唐宋词的美学接受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论述。赵山林也有《词的接受美学》(《词学》第八辑)一文,详细地论述了词的接受。

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独白式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存在。”^①对这一段话,朱立元作了精辟的诠释:“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②由此来看,文学创作活动应是一个由作者、作品、读者和客观世界四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互动过程。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这四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读者和客观世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那么对文学作品意义、价值的鉴定,就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卡尔·包勃尔曾经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有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人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观察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去补足前人的不足。”^③这正体现了不同时代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那么鉴赏柳永词和周邦彦词,就不应再仅仅局限于作者和作品,而应换一个角度,从历代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柳永、周邦彦词在历代的 effects 以及历代读者的反应批评,这样我们对柳永、周邦彦词的意义和价值,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发现。对于二人及其词之间的种种相似与不同,如果能从读者接受这一角度去看待,进而作一些分析探讨以

① H. R. 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见于《论接受美学》1982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② 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6页。

③ [英—奥地利]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见于《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发掘其特殊性,我想对于我们理解、认识柳永、周邦彦各自独特的“这一个”应该是不无裨益的,因为决定事物本质的是其特殊性,不讲特殊性,就无法说明事物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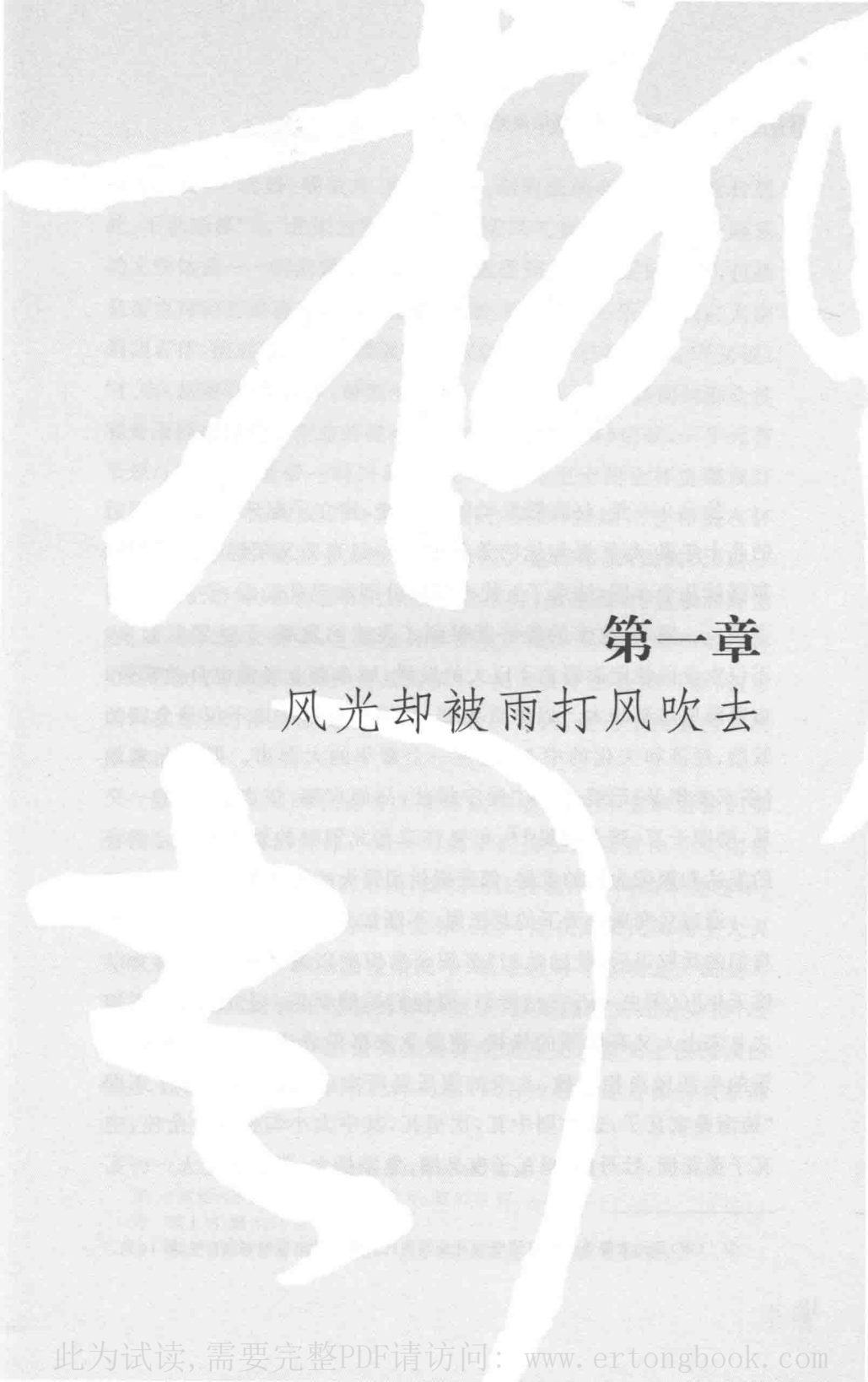
在这里“读者接受”,是指普通读者的反应、创作者的学习借鉴和批评家的批评等方面。这些方面,历代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从“泛述闻见”“奇闻轶事”到“诗话词话”以及“话本小说”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据统计,仅《词话丛编》中,有关两个词人的评论,就有700多条,再加上诗话、历代笔记、琐谈等各种著述中能收集到的相关条目,数量还是很可观的。这使得我们从“读者接受”这一角度,对二人进行并行分析论述成为可能,因为丰富的材料是进行任何研究的前提条件。对于柳永、周邦彦词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以及二人及其词之间的种种异同,并进而拓展到二人及其词所反映出的一些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如果能从历代“读者接受”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作家和作品给予关照,我们会有更加真实、更加客观的认识和发现!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考察词人词作,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对读者接受历程,即“接受史”的梳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以至于历代的接受情况,才能对词人词作的总体接受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本文即以时代的发展为纵向线索对两位词人在历代的接受情况,作一个纵向的史的梳理,考察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评判标准和尺度下,对柳永、周邦彦词的评价和接受有什么不同和变化。而以同一时代两位词人的接受情况(包括接受的文本、接受的效果、接受的人群、后世词人所受之影响以及对词人本身的接受等方面)的对比为横向线索进行考察分析,比较他们的异同。但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对造成两位词人接受情况前后变化以及同一时代异同的原因,从文化机制、文学思潮、审美

风尚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并进而引出对词的体性、词的本色、词的正变等词的本体论方面的一些探讨,以期对前面所述问题,能给予一个新颖而又比较可信的解答。

鉴于上面所述,本书将柳永、周邦彦的接受情况从纵向上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分为六章来论述,即柳永、周邦彦词在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清代的接受情况,每一章又从横向上分为选本中的柳、周词,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以及柳、周词对词人创作上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柳、周词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能对柳、周词的接受情况有一个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鉴赏传统诗词等文学作品,是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诗文批评中的运用,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料积累,而且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二者都是本书望尘莫及的境界,但本书还是斗胆尝试,将柳永、周邦彦词置于这种高要求的研究范式中,以期以科学规范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管窥之见。有人曾言“无知者无畏”。本书的研究或许就是这样!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了《哈姆雷特》以后,都会结合自身的体验和感想,在心中浮现出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不论这种认识是浮浅还是深刻,它都是独特而真实的体会。接受史的研究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每一种认识都是汇集成川必不可少的小溪,只要文学作品拥有读者,就存在被接受、评价的情况,只不过论调的褒贬抑扬因人、因时代而不同而已,而我们则置身其间,就事论事。



第一章

风光却被雨打风吹去